



刘红富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国学热”中,被“发掘”出来的前辈学人曾引领风骚。有关陈寅恪的掌故逸闻广为流传,不可否认,这些与纯学术关系不大的陈寅恪掌故,对塑造“中国读书种子”陈寅恪的形象,起到了纯学术著作所起不到的作用。但陈寅恪之所以被人们视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主要是因为他在中国学术上为我国学术由旧入新、跻身世界学术之林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人格上坚守“为学不作媚时语”的风骨节操。

进入本世纪后,学界开始冷静理智地研究陈寅恪,以掌故为热门话题的年代已经过去。在研究、弘扬陈寅恪学术、人格、思想的任务面前,对陈寅恪系列掌故中他的名字旧读音似可不必过于执着。然而部分与陈寅恪有直接、间接关系(家人、弟子、陈寅恪任过的高校、文化学术界)的人,出于对陈寅恪的景仰和对que音的感情,坚持只能念que不能念ke的观点,形成了念que没有文化,念旧读音que才有学问,是学界中人的意识,一个简单的语言学问题被人地地复杂化、符号化了。个中缘由,值得探讨分析。前人非常在意大贤大德的名讳,要求正解正读。若一名二读,则速于礼也。这是我关注陈寅恪名字读音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陈寅恪故里——江西修水县,众多陈氏宗亲多年来一直按祖辈流传下来的乡音ko(古入声)称呼本族的“恪字辈”。县里的读书人、政府官员也一直用ko称呼乡贤陈寅恪及其兄弟的名讳。但这种形势没有维持多久,一些人受山外念que有学问风气的影响,开始念que,下一步势必逼近、影响乡村的陈氏宗亲读音。为了延续“草根方言”的纯洁性,我撰写了《谈陈寅恪“恪”字读音》一文(《文史知识》2009年第6期发表)。拙文旨在澄清主张念que者为突破《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不取que音只载ke音的障碍而讹传“陈寅恪老家方言客家话念que”“陈寅恪本人念que”之说,披露陈寅恪家族史与其名号读音的关系,列举新发现的



陈寅恪1945年赴英护照及签证

陈寅恪本人署名标音ke,ko的材料,提出“在公众场合使用规范读音ke称呼陈寅恪先生及其昆仲的名讳”的观点。

进入本世纪后,学界发掘陈寅恪在各种表格证件、书信、论文上署名标音ke,ko的文献资料已有50余例,可谓证据确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传的“陈寅恪本人念que”因此渐渐降温(“陈寅恪老家方言客家话念què”则仍在以讹传讹)。但文化界近年有人又推出他“本人外文签名用ke,但说中文时用que”和其家“至亲三代都念‘que’”之说。陈氏宗亲迅即予以回应,在桃园乡几十个恪字辈中召集九位年纪较大者现身说法,用乡音ko念自己的名号和宗兄弟陈衡恪、陈寅恪的名讳,表明客家人的文化立场。制成视频光盘,留下一份珍贵资料(2018年9月11日凤凰网国学频道以《陈寅恪的名字究竟怎么念?他本人只读这个音》和《乡音与族谱:陈寅恪故里“恪字辈”怎样读名为题播出,腾讯网则以《陈寅恪故里恪字辈怎样念自己的名字》为题播出)。

我个人认为陈寅恪“外文签名用ke,说中文时用que”的说法有待修正。按照这个说法的字面意义,陈寅恪一方面在书面上署名标音que,一方面又在口头上念que,难免使人质疑他对自己名字读音的真正态度。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无助问题的解决,已有语言学专家撰文指出陈寅恪当时在北平方言环境中不得不顺应时势默许别人念que,自己亦可能在某些社交应酬场合为尊重别人而念que,他的容忍产生了很大影响,被

坚持念que者当作重要依据。事实上陈寅恪本人从未认可世人念que成俗。上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师生念他的名字为que已很普遍,而他作为图书管理员毕树棠说念que是误读,只是那么多人非那样念,没有必要去纠正。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出自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对毕树棠的采访是孤证,那我还可为举出一个旁证:陈寅恪的学生卞僧慧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见毕树棠家诫念que的学生“陈先生名字只有一个读音ke”。毕树棠为什么这么有底气,那是因为他问过陈寅恪本人。这也是卞僧慧一直坚持念ke的原因。在清华,知道陈寅恪用ke音的可能不止毕树棠、卞僧慧、黄延复,因为清华档案中,凡陈寅恪外文签名,寅恪二字均为Yin ko或Y.K.。如1941年,校长梅贻琦给清华驻港的陈寅恪弟子邵循正写了一封英文信,请他就地敦促在港的陈寅恪返校,信中提醒邵循正注意陈寅恪名字要标音为Yin ko Chen. 1942—1945年间,陈寅恪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任教。此时成都文化知识界念que成风,但陈寅恪对学生石泉说“我的名字念ke”,1945年秋在赴英国的护照签证上手填ke,ko。1946年,陈寅恪夫人唐筼代笔写给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英国收信地址标音ke. 1956年,陈寅恪口授、唐筼代笔的中山大学专家调查表上署名标音ke,ko。可见其夫人虽然习惯念que,但在重要的文书上,还是以陈寅恪的态度为标准的。凡此种种,均可说明陈寅恪在对待自己名字读音的问题上“外不殊俗,内不失

正”的处理原则,为证明自己念que没问题而寻找证据的人们应该明晰。毕竟在具有法定文书性质的证件上署名标音比口述资料更有说服力。十多年前陈寅恪的一位后裔曾说“他本人外文签名是k,可见他认为应该念ke”,我觉得这个说法比陈寅恪“外文签名用ke,说中文时用que”要好,它没有把一件因果相连的事情折成逻辑关联不紧密的两截。

陈寅恪名字之所以有两读,其根子在北平方言旧读上。清末民初以后,北平流行“恪”字正读音ke之外的又读音que。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陈寅恪不在北平工作十年,其名字就有可能只有一个读音ke。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一些人把他的名字念成北方方言的que不是天经地义的。陈寅恪的部分弟子和后裔钟爱que这个民国旧读音可以理解,但不能成为只能念que不能念ke的理由。从1956年开始,国家语委下属的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北京话的方音土语进行了多次修订,分三批公布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恪”字的又读音que在第一批中就被废止了(1959后《新华字典》“恪”字不再保留que音)。1985年12月,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电部联合公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正式确定“恪”字“统读”为ke,即“此字不论用于任何词语中只读ke音”(主持这项工作的学者徐世荣在解释《审音表》时特别举例“人名如近代学者陈寅恪”)。国家主管部门把一个字的读音规范得这样明确细致,实属罕见。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在某些场合,特别是在自己家里,怎么称呼,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到了公众场合,就应该使用规范读音。

退一步讲,即使辞典工具书如《辞海》仍然保留que这个旧读音,根据陈氏家族史提供的文史内涵和陈寅恪名、字的对文互义,在ke、que这两个读音之间也以选择ke音为宜。其原因“恪”是陈氏宗族一个辈分用字。清咸丰元年(1851)恩科乡试,陈文凤和陈宝箴(陈寅恪祖父)中举。修水客家陈姓欢欣鼓舞,借此喜庆,敦促二陈编纂《修水宗谱》。两位新科举人制定了“三恪封虞后,良家重海邦。凤飞占远

耀,振采复西江”的行辈用字(修水民间称之为“派号”)。“三恪封虞后”典出我国古代的一项礼制(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古代新王朝为巩固统治,对前朝贵族后裔赐予封地,以示尊崇。周武王灭商后,天下后,封夏、商之后于杞、宋,封虞舜之后妫满于陈非氏部落故地宛丘,并将长女太姬嫁妫满,建立陈国,其子孙后代遂以国为姓。因此,陈文凤、陈宝箴制定的“三恪封虞后”派号概括了陈氏受姓的尊崇和史源,也昭示着“恪”字的形、音、义与“客”字的同源共通关系。修水另有一个陈寅恪取字“敬宾”,准确地阐释了“恪”“客”二字音义互训的关系。

按“恪”字本义为“恭敬”,《诗·商颂·那》:“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寅”字亦有恭敬之义,《尚书·皋陶谟》:“同寅协恭,和衷哉。”(尔雅·释诂):“俨、恪、祗、翼、譔、恭、钦、寅,敬也。”故“恪”“恭”二字常常对文互义,东晋十六国的前燕名将慕容恪字玄恭。湖南近代书画家雷恪字恭甫。《白虎通·姓名》:“闻名即知其字,闻字而知其名。”这就是陈寅恪名恪、字彦恭的经义出处(其宗兄衡恪字师曾,隆恪字彦和,弟方恪字彦通,登恪字彦上。衡恪、隆恪、方恪名、字均用。寅恪、登恪因在国外留学久,故取字未用)。

在江西修水和邻县铜鼓县,奉新县,自客家陈姓通谱派号颁行后,著录在宗谱上的恪字辈有960余人,其中陈寅恪家族的恪字辈有60人。在这近千人的恪字辈中,曾有6个“陈寅恪”。因此陈寅恪的名字究竟怎么念,不能不考虑“恪”是陈氏宗族的一个派号,众多的恪字辈成员都不将自己的派号念成que这个客观历史事实。既然960个恪字辈959个不念que,与陈寅恪有血缘关系的60个恪字辈兄弟59个不念que,6个陈寅恪5个不念que,那么,根据行辈派号不能异读的逻辑常识推理,这个同根共源的陈寅恪也不应念que。说到底,陈寅恪的名字怎么念,最有权威性的还是陈氏宗族的谱派。在陈寅恪出生之前,“三恪封虞后”的谱派意义早已昭示于众,敦促二陈编纂《修水宗谱》。两位新科举人制定了“三恪封虞后”,que这个出自北方方言的异读不能准确地承载传达以

“客”礼尊奉虞舜、夏、商后裔的经典本义,与“恪恭”的经义关联亦不紧密。我们的前人在诵读经书中的“三恪”和“恪恭”词语时,能“三恪”“三que”和“ke恭”“que恭”两读并行吗?显然不能。

当我们了解了陈寅恪名号的来历之后,就会明白,“恪”既然是陈氏宗族的一个辈分,就是一辈人的名号怎么念的问题。如果坚持只能念que不能念ke,既违背谱派创制人陈宝箴的意愿,也违背陈寅恪及其兄弟的意愿。

清同治九年(1870),陈宝箴就官湖南,娶眷定居长沙。陈氏家族最优秀的一支从此走出山外。其孙辈均在长沙出生,自会讲长沙话(长沙话土语“恪”字不念què),但老家话也与生俱来地融入他们的记忆中。陈宝箴夫妇、陈三立离开老家后,一直坚持讲老家话。陈宝箴任职的衙署内常有老家来客。陈氏兄弟自幼与祖父母和老家来的宗亲、姻亲、佣工朝夕相处,在乡情浓厚的语言环境中,自然熟悉老家话。老大衡恪由于年辈较长,与祖父母(陈宝箴夫妇)及老家宗亲接触较多,能流利用老家话与父、祖对话。修水方言土语因音位系统和无唇擦音,故发北方口音的que音颇拗口而发ko音更顺畅,老四方恪正因为也会讲老家话而用ko音自称,与老家的发音一模一样。老三寅恪署名用ke, koh, ko标音,后两种即修水老家入声。1955年,方恪在户口登记簿上用民国注音字母标音“恪字辈”。1956年,寅恪在中山大学专家调查表上用外文标音ke,ko。上世纪四十年代寅恪对学生石泉说过自己的名字应念ke,方恪也在同一时期对后学石学涛说过应念ko。这说明陈氏兄弟对自己名字读音的态度是一致的,也说明他们从小到老都没有忘记父祖从老家带来的恪字读音。1989年冬,陈隆恪女儿陈小从回乡寻根认祖,将修水之行情况写信告诉姑姑俞大维(陈寅恪妹夫)。时俞大维已年逾九十,回忆犹问“老家族人还讲客家话吗”,可见老家话在他们那一辈印象之深。故我认为所谓陈寅恪家“至亲三代都念北方口音‘que’”的说法尚须回到历史现场,从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空间来考察分析,参合审定。

外研社大学英语教材出版探索

玉 树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国内高校英语教学领域,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模式导致了学生的实际语言应用能力与卷面分数存在较大差距,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这样一种局面对于承担外语教材建设任务的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1世纪初,随着素质教育的持续进行,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全面实行大学扩招;2001年,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中小学教材出版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和《中小学教材发行招标投标试点实施办法》,推动我国教材出版发行改革启动。

另一方面,外研社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勇于实践与全面改革的十年,在社长李明义《外语教学与出版社改革》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正面对一个蓄势待发的全新局面。

在这种新局面下,李明义分析了形势变化,果断提出了“以教育出版为中心”战略。外研社认为,随着大、中小学教材市场的逐步放开,外语教学领域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外研社经过十年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大批如《新概念英语》《许国璋英语》《汉英词典(修订版)》等知名品牌,成功占领了市场。而外研社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出版社,使

得外研社有资源上的独特优势。“以教育出版为中心”这一发展战略,确立教育出版为外研社业务发展的中心,为外研社后续改革探索指明了方向。

1999—2009年,是外研社成立的第三个十年。这十年,外研社以大学英语教材出版为发轫,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面旗帜。

90年代的南方市场调研

1989年,李明义从英国利兹大学学成回国,被任命为外研社编辑部主任和总编部主任。留学经历让李明义具有了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使他耳濡目染了国外市场经济下的出版文化。回国以后,李明义的第一件事就是结合当时形势,带领青年编辑们风餐露宿开展市场调研。他带着青年编辑蔡剑峰奔赴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南方四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关于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情况的调研。

1990年的元旦,李明义和蔡剑峰是在外地度过的。二十几个小时的硬座,七八个小时的站票,没有暖气小旅馆,阴冷潮湿的被窝,街边小摊满是肥肉的饺子……再艰苦的条件也没有阻碍二人奔赴各地的调研进程。他们带着盖有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公章的信函,一一走访了南方四省三十余所高校,其中既包括了中山大学这样的知名高等学府,也包括一些普通或专科等各级各类院校。

通过调研,李明义发现,当时可供选用的大学公共英语教材非常少,且存在着重语法、轻实践,重书声、轻口语的问题,没有给学生提供充分的语言训练与实践,不能满足新时期扩大改革开放和对外交往的需求。

大学公共英语是外语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领域。提高国民外语素质,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提高大学生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听说水平。编写一部新的大学英语教材刻不容缓。而当时出版大学公共英语教材的出版社只有少数几家出版社,外研社尚未涉足。李明义决心出一套适合时代需求的新型大学英语教材。



李明义社长(中)与《当代大学英语》英方主编Neville Grant(左)及朗文亚洲公司董事长沈维贤先生

调研之后,外研社向教育部高教司外语处提交了一份关于大学英语教材市场的调研报告,获得了处长杨励的支持。

1990年3月,李明义被任命为外研社副社长,兼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室主任。从组织第一批作者开始,外研社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大学英语教材出版探索。

终成经典的《当代大学英语》

经历了在各地的广泛调研,确立了进军大学公共英语领域的战略。李明义开始将注意力转移至国内众多的英语教材作者身上,希望能寻到良材,聘请优秀的教材作者编写或者合作出版一套全新的大学英语教材。

要在当时的国内高校英语教学领域寻找一位满意的作者并非易事。因担心高校教材作者会受到限于旧的模式,最初李明义曾一度希望自己的恩师,著名英语教育家许国璋先生担任教材主编;之后也曾尝试过班班,由北外英语系教授担任主编,北航英语系教授为副主编启动编写,可惜均未成功。

虽然遭遇种种波折,但李明义坚定地认为,高校英语教材的改革必将为历史的潮流。积攒了数年的调研经历和尝试经验让外研社坚信一定能够突破重围取得成功。

以及教师用书陆续出齐。李明义将其命名为《当代大学英语》。《当代大学英语》是一套新型大学公共英语系列教材,分两个模块6个级别,以阅读真实英语文本为基础,突出培养学生在交际互动方面的能力,同时配有听、说、读、写技巧之间的循环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素质与自主学习能力。这套教材以其充分重视学生的交际互动能力而备受好评,被全国众多高校作为英语本科指定教材,又因其有利于培养学习者自学能力和网络教育特点突出的优势,《当代大学英语》还被列为北外网络学院指定教材,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领先数年的《新编大学英语》

实施以“教育出版为中心”战略,仅有一套教材是远远不够的。90年代中期,在筹备自主编写大学英语教材时,党支部书记徐秀芝等注意到了浙江大学教授邵永真、应惠兰教授组织编写的一套大学英语教材。这套新教材的编写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在素材选择方面,贴近大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和感兴趣的话题,语言地道,内容有趣味性;在课堂教学方面,强调外语是一门实践课,应该将三分之二的课堂时间交给学生去阅读及听说,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这套教材在浙大试用两年后,邵永真、应惠兰教授也正在考虑寻找出版社正式出版该教材。

凭借着对社会形势的洞察和对大学英语教学趋势的预判,参照西方的教学理念,社长李明义认定这套教材代表了大学英语的发展趋势,必将引领大学英语的改革方向与发展潮流。于是,外研社积极争取这套教材的出版。徐秀芝、蔡剑峰数次亲赴浙大,全力争取。据编辑叶向阳回忆,应惠兰教授首次来京洽谈时,李明义亲自在外研社设宴招待,当场拍板先期给浙大教改组投资一笔启动经费,并在外研社成立大学英语工作室,由当时的副社长赵文炎兼任主任,派编辑叶向阳跟随教材编写团队,配合教材编写出版。外研社诚恳的态度与巨大的热情打动了作者,他们最终

决定与外研社合作,出版这套教材。

1998年,教材第一、二册正式出版。李明义与作者商定为教材命名为《新编大学英语》,并于接下来几年出版了全套1-6级和基础教程(包括教师用书和学生用书)。《新编大学英语》出版后,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普遍好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以及由此引发的有关教学主体、教师角色、学习策略等方面的讨论,在外语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007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指出“教学模式的改变,是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实践教学思想,向以学生为中心、既传授一般的语言知识与技能,更加注重培养语言运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思想和实践的转变”。此时,距外研社对大学英语教学必将“以学生为中心”的预判已过了近十年。《新编大学英语》对教学实际和政策导向的前瞻性也领先了十年。

此后,外研社根据新的教学要求,对《新编大学英语》教材进行多次修订,在保持“以学生为中心”这一教学理念的基础上,优化了教材结构,增加了新的内容,完善了多媒体资源,以满足新形势下大学英语的教学需求。



应惠兰教授

长风破浪四十年

